

中美苏(俄)三国大角逐

炎更 编著

遏制与反遏制

时事出版社



遏制与反遏制

——中、美、苏（俄）三国大角逐

时事出版社

遏制与反遏制

——中、美、苏（俄）三国大角逐

（中 册）

炎 勇 编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遏制与反遏制:中美苏(俄)大角逐/炎勇编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1

ISBN 7-80009-357-3

I.遏… II.炎… III.①中美关系-概况-1945~②中苏关系-概况-1945~③美苏关系-概况-1945~ IV.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595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2 字数:11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58.80 元

义，丧失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这时，科兹洛夫开始即席发言，他将两肘支撑桌面，两手互相摩擦着说：“国际会议上，你们中国代表团总是持特殊立场。比如你们的廖承志、刘宁一，在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上总是唱另一个调子，有自己的特殊路线！”

邓小平仍然是不紧不慢地说：“想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别的国家，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别人跟着你的指挥棒转，这是行不通的。”

科兹洛夫从鼻子里哼一声道：“哼，我们苏共总是在抓国际上的大事，你们中共总是在那里抓苍蝇！”

邓小平并未理睬对方的用语，而是强调原则：“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是改变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要不要支持？各兄弟党之间要不要坚持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原则？还有和平过渡问题，斯大林问题，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原则问题？”

“对于斯大林的种种罪行我们必须加以谴责！”苏斯洛夫提高了声音，这显然是苏共新领导在政治斗争中最为敏感的问题。

“斯大林有错误，有些甚至是严重错误，可以批判，但为什么要一棒子打死？”邓小平犀利的目光在苏斯洛夫脸孔上扫过，“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呢？为什么拿不出勇气对他做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呢？”

“他专横跋扈，是个暴君，对苏联人民犯下了粗暴的罪行！”

“当苏联人民高呼他的名字，前赴后继同希特勒法西斯展开殊死搏斗的时候，当苏联人民紧紧团结在以他为首的苏共中央周围，保卫和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们呼喊的难道只是一个暴君？”邓小平嘴角掠过一丝讥讽的浅笑，迅即又严肃地盯紧苏斯洛夫，“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这样丑化他呢？”邓小平目光变得严厉：“你们为什么听见他的名字就害

怕，难道他的魂把你们迷住了？”

苏斯洛夫的目光在邓小平脸上稍触即离，始终不敢正视。苏斯洛夫及时改变了话题。

就在会议期间，苏方与英、美两国草签了针对中国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议。

条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限制中国拥有核武器，由苏、美、英3国垄断核武器。

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这个针对中国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议，使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又增添上一层阴影，双方的分歧与争论更趋激烈。

这次会谈约进行了两个星期，会议期间未给中国代表团安排任何参观和娱乐活动。

会议休息时间，邓小平和彭真常在一起散步。有一次他们在散步时，议论赫鲁晓夫故作姿态地建议停止论战。

彭真说：“他们把我们骂够了，不外乎就是来这招儿，要求停止论战，堵我们的嘴，不让人民知道事实真相和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笑道：“可以呀，他们要承认他们原来骂的都是错的，然后再停止。”

会议期间，苏方在最高苏维埃小宴会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过两次小宴会。宴会目的不外乎缓和一下气氛，却始终未能如愿。

“我们应该停止论战。”苏斯洛夫确实担心中国共产党发表重头文章，他大概有了什么预感。

“可以停止。”邓小平面带笑容，笑得轻松，讲得坚定，“我们可以停止论战。但你们要承认你们对我们的攻击是错误的，否则你停止论战的提议就是不真诚的。”

“如果你们有诚意，就应当无条件地立刻停止！”赫鲁晓夫

推脱责任。

“你不要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邓小平保持着他那惯有的沉稳声音，“我们一贯要求停止，一贯主张不应公开论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就一直在劝你们，几年了，你们始终不听。现在你们骂够了，不许我们答复，我们不能接受。”

赫鲁晓夫容易反复无常。当他和美国关系缓和，诸如在美苏戴维营会谈等活动中有所得时，便攻击中国，有时简直是肆无忌惮。当他和美国关系紧张时，比如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与美国较量以失败退却告终时，就无可奈何地被迫表示中苏友好，希望忘掉过去。

然而，邓小平是国内外闻名的政治家，他有“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具有领袖人物的深远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战略洞察力。

当赫鲁晓夫控制不住情绪，缺乏一种大国领袖人物所必须具备的清醒冷静的头脑、缺乏深思熟虑，因而讲出一些草率的话、做出草率的行动时，邓小平不止一次当面提醒他：“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并不止一次地讲过：“最终你要负历史责任的。”

7月20日，邓小平率中国党的代表团结束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党会谈，返回北京。

出于安全的原因，中国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当飞机在西郊机场刚刚停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迎向舷梯，欢迎伟大的“反修主义者”归来。据说邓小平以前从未受过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

这次会谈未取得任何进展，更谈不上什么一致意见。达成的唯一一项协议是：谈判暂告一段落，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

一个半月后，中国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一评”到“九评”。说起来也巧，随着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声，赫鲁晓夫在国内外的一系列困境中倒台了。

据说，赫鲁晓夫开始还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希望能再次出现1957年苏共中央6月会议那种转变。但是众叛亲离，在10月13日夜间会议休息时，终于被米高扬说服，“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公布于世界各报刊上的“辞职申请书”。苏联新闻界称赫鲁晓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要求被解除职务。

赫鲁晓夫解职后，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苏共新领导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中国和其他6国党拒不参加。此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1966年3月，苏共召开23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中断。

回顾这场论战的历史，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

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

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他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

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

至于过去争论的另一个方面，邓小平说：

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第五节 中苏大论战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曾爆发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如今，这场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如果我们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可以感到当时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56—45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中共的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外交部八年》中（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四辑），曾写及当年的陈伯达的文章造成的错误影响：

1958年5月我奉召被调回国内（引者注：当时伍修权担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一到家就先在外交部把我批了一顿，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作检讨。我听了对我的批判，又重新看了我从南斯拉夫发回来的几个电报，自己也觉得同国内的调子相距太远了，我的报告肯定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南共纲领中有着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一面。而国内的论调却把南共纲领说成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

我对这些说法起初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时，仍然讲了一些南斯拉夫真实情况。但是我个人看法改变不了上面定的调子，当时康生和陈伯达对这事就特别起劲，他们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大骂“以南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康生、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

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九十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九十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中共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

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起草。

国宾馆灯光彻夜

钓鱼台，这座北京西城三里河附近的国宾馆，因“文革”中那里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而闻名全国。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另外两名“秀才”只是挂名，并未参加多少具体工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

这个“秀才班子”的助手有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

此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为“秀才班子”提供许多资料，但不算是“秀才班子”成员。

对于如此重要的“秀才班子”，陈伯达当然要插上一手。但是，那里已被康生所控制。陈伯达参与了一部分工作，而领导权毕竟落在康生手中。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出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

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爨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

的那句话。幸亏他在毛泽东身边多年，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

另外，毛泽东嘱，送金日成、胡志明征求意见。

此文在1963年6月14日发表，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亦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二十五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除了正面阐述了中共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九评”是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写的。陈伯达有时参加审稿，不像写《二十五条》那样亲自主稿——因为康生在主持“九评”写作，他就不便插手了。

“九评”的篇目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康生、陈伯达这两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他们也是这场论战的最大受惠者,从此以后深得毛泽东的信任,青云直上。

陈伯达在1960初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六节 美国企图摧毁中国核武库

美欲联苏对付北京

1961年1月太平洋美军总部呈报华盛顿政府称中国可能会在1962年年底试爆原子弹，并将在1965年拥有小型核子武器。

担任过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顾问的罗斯陶日后回忆说，中国将拥有核武的消息，把大家都吓坏了。他说：“60年代最大的事件，也许是中国试爆核武。”

“联俄制华”或是玩“中苏分裂牌”，一直是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大战略”的重心。

肯尼迪和他的智囊团对中国人，一直抱着政治、文化与种族上的偏见，他们认为苏联“还可以谈一谈”，中国则“不能与之言”。张少书指出，美国头号苏联问题专家乔治·肯楠即是一个极为反华的人，他大力主张美苏发展密切关系，只有美苏关系改善和强化，才能有效地对付中国。

1961年6月美苏高峰会议在维也纳开始闹别扭，白宫和国务院幕僚建议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尽量利用中苏不和以争取苏联，并寻求与莫斯科达成对中国问题的共识。然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高峰会的表现，却让肯尼迪大失所望，苏联领导人根本不把肯尼迪看在眼里。肯尼迪以为可以利用中苏斗嘴来换取苏联友谊，而进一步组成美苏联盟以斗垮中国，但赫鲁晓夫表示仍支持中国，亦强烈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的